

QIANQI FAJIA YANJIU

前期法家研究

● 山东大学出版社

● 曾振宇 著

前期法家研究

——法、术、势社会政治理论的建构

曾 振 宇

山东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申海田

特约编辑:徐史明

版式设计:张华芳

责任校对:张华芳

前期法家研究

——法、术、势社会政治理论的建构

曾振宇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 10.5印张 273千字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5607-1698-9

K·129 定价:12.00元

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前期法家研究》，是一位青年学者曾振宇在其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处女作。先秦诸子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宝库之一，她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最辉煌时期的最辉煌成果的结晶。二千多年来，数以万计的中外学者对先秦诸子进行校勘、考订、辑佚、补正、诠释、研究，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资料和著作。显然，后世学者从事对先秦诸子的研究，讲出一些前人未曾说过的新颖论点实非易事。本书的价值在于，著者在对前期法家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慎到、申不害、商鞅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迥异前人的观点，从而使其具有了相当的学术含量。不管你对其论点接受与否，你都应该承认，这里展示的是著者独立自得的沉潜思考。

应该承认，法家在先秦时期曾是诸子百家中一个势力强劲的学派，她介入政治，创下了其他任何学派无与伦比的事功。而在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皇朝，她又独领风骚，使秦帝国统治下的二千万臣民领略了她“刻薄寡恩”的酷烈统治的滋味。然而，秦朝“独尊法术”，留下的却是“二世而亡”的失败的纪录。此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法家受到的是被百般詈骂的待遇。尽管有些人也对她发出一点赞美之词，但那点空谷足音，不仅应者寥寥，而且根本无法同怒斥詈骂的声浪相抗衡。平心而论，法家在封建社会的遭遇虽有不尽公平之处，但还是咎由自取。因为第一她极度崇拜权力，认为有了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第二，蔑视道德，在她的视野里，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私利之外，一切亲情、

信义都不存在。一个迷信权势，视道德如弊履的社会决不是一个协调、有序、安乐、和谐的社会。法家的致命伤即在于此，儒家的优长之处就在于反法家之道而行之，特别重视道德的功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之所以行得通，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法家的优长也十分突出，她的“不分贵贱亲疏，一断于法”的意识，“循名责实”的治国之术，恰恰是儒家所缺乏的。汉代以后的儒家虽然不时骂骂法家以显示自己崇高的道德意识，但却不能不吸收法家的治世之术。本书对前期法家特别是商鞅思想的剖析，对我们认识法家思想的内涵，她的优长与缺陷以及她在汉代以后失势的原因，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本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潮势头不减，反映了中国历史大转折时期大陆学人从文化的层面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反思。在此热潮中，儒家思想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受到重视。比较而言，法家思想的研究则显得冷落一些。其实，法家思想也是传统文化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中，法家思想中的精华仍然可以提供不少启迪与资鑑。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出版也是值得欢迎的。

由于本书的著者是一个年轻人，理论、学识、素养等都嫌不足，因此，书中方方面面的稚嫩之处在所难免。期望学界前辈师友和广大读者本着“爱人以德”的宗旨，不吝批评指正。

孟祥才

1996. 7. 10

目 录

序	孟祥才
---------	-----

第一编 引子：法、术、势社会政治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	(1)
第一章 战国——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诞生	(1)
一、铁器·牛耕·水利工程	(2)
(一)铁器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2)
(二)牛耕技术的普及	(5)
(三)星罗棋布的水利工程	(7)
二、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9)
(一)李悝变法与《法经》	(10)
(二)公仲连在赵国的变法	(15)
(三)吴起在楚国的变法	(17)
三、“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20)
(一)秦国的建立	(20)
(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22)
(三)商鞅变法前的土地制度	(25)
(四)秦献公的改革	(27)

第二编 商鞅与法

第二章 《商君书》探源

一、历代学者对《商君书》的考索	(30)
二、《商君书》源流考证	(36)

第三章 从布衣到入仕

一、入关前的生平事迹	(49)
(一)商鞅与尸佼的关系	(49)
(二)公叔座临终荐商鞅	(57)

二、御前大辩论	(58)
(一)四见秦孝公	(58)
(二)御前大辩论	(59)
(三)立木建信	(62)
第四章 第一次变法	(65)
一、颁布垦草令	(65)
二、什伍制与连坐制	(71)
(一)什伍地方行政建制	(71)
(二)人人自危的连坐制	(73)
三、奖励军功,推行赐爵制	(79)
(一)封建赐爵制的萌芽	(80)
(二)赐爵制的爵名、爵序与爵等	(84)
(三)赐爵制的类别、条伯与对象	(87)
(四)赐爵的程序	(90)
(五)获爵者的权益	(92)
(六)高、低爵界限的划分	(97)
(七)赐爵制的历史意义	(98)
四、“燔诗书而明法令”?	(99)
五、来自两方面的反馈	(102)
第五章 第二次变法	(105)
一、土地制度的改革	(105)
(一)国营土地	(106)
(二)按户计口授田制	(108)
(三)变法后土地制度的主要特征	(111)
二、田税、口赋、徭役	(115)
(一)田税	(115)
(二)口赋	(119)
(三)徭役	(121)
三、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迁都	(124)
(一)推行县制	(124)

(二)统一度量衡	(125)
(三)迁都	(127)
四、封建改革的初步成果	(128)
(一)变法后的第一次盟会	(128)
(二)变法后的第一次对魏大捷	(130)
(三)攻占河西地	(131)
(四)“首身离兮心不怨”	(133)
第六章 秦国封建制的全面确立	(140)
一、封建制度的全面完善	(141)
(一)中央机构的完善	(141)
(二)地方行政建制的完善	(142)
(三)法律制度的丰富与发展	(144)
二、封建阶级结构的形成	(147)
(一)农民阶级	(148)
(二)地主阶级	(150)
(三)手工业者、商人	(151)
(四)奴隶阶级	(152)
第七章 商鞅哲学思想	(156)
一、人性论	(156)
(一)人性好利	(156)
(二)“利出一孔”	(159)
(三)朴愚人格	(162)
二、认识论	(165)
(一)“人主执虚后以应”	(166)
(二)尚力的真理观	(167)
(三)朴素辩证法思想	(169)
三、瑕瑜互见的历史观	(172)
(一)英雄创造历史	(172)
(二)“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176)
第八章 尚法的政治思想	(180)

一、重刑主义的立法原则	(180)
(一)法的起源	(180)
(二)法概念的基本特征	(185)
(三)“重刑主义”的历史与理论根据	(188)
(四)“重刑主义”的立法原则	(191)
二、“明白易知”的司法原则	(201)
(一)“天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	(201)
(二)“为法令置官吏”	(205)
三、政治理想:从“法治”到“自治”	(207)
(一)从“法治”到“自治”	(207)
(二)政治理想的内在缺陷	(211)
第九章 军事思想	(213)
一、战争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213)
二、防御战理论	(217)
三、攻坚战理论	(219)
第十章 千年沧桑评商鞅	(227)
一、韩非评商鞅	(227)
(一)赞赏·理解·同情	(228)
(二)“商君未尽于法也”	(230)
二、两汉十家评商鞅	(233)
(一)毁多誉少派	(234)
(二)亦褒亦贬派	(237)
(三)讴歌派	(238)
三、“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	(241)
第三编 申不害与术	(248)
第十一章 申不害生平	(248)
一、从“三家分晋”到跻身“七强”	(249)
(一)三家分晋	(249)
(二)跻身“七强”	(251)
二、相韩十五载	(252)

(一)亲魏	(252)
(二)助魏伐赵	(254)
(三)以术治韩	(255)
三、《申子》一书考辨	(258)
第十二章 申不害思想	(260)
一、崇术的政治理论	(260)
(一)“术”概念的含义	(260)
(二)“术治”的基本内涵	(262)
二、言行相悖的“法治”思想	(269)
三、申不害与术家	(272)
(一)问题的由来	(272)
(二)申不害既非黄老也非法家	(273)
第四编 慎到与势	(280)
第十三章 慎到生平	(280)
一、稷下先生	(280)
(一)“不治而议论”	(280)
(二)稀疏的史影	(283)
二、《慎子》源流考	(286)
第十四章 慎到思想	(289)
一、哲学思想	(289)
(一)“齐万物以为首”	(289)
(二)从因循自然到不可知论	(291)
二、政治思想	(293)
(一)重势	(293)
(二)尚法	(297)
(三)君道无为,臣道有为	(305)
(四)“立天子以为天下”	(310)
三、慎到与黄老思想	(312)
(一)黄老思想略论	(314)
(二)慎到应是黄老思想家	(316)

第一编 引子：法、术、势社会 政治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第一章 战国——一个新的社会形态 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将它放到特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去考察。“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①应该“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②商鞅一生处于波诡云谲的社会大变革潮流中，这场深刻而艰难的社会大变革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思想、他的个性，无不打上了这一特定时代的烙印。成年后，商鞅积极投身于这一时代浪潮中，义无反顾地为将这场封建改革运动推向深入作出了不可湮没的历史贡献。因此，在具体铺陈与评述商鞅等人事功和思想之前，完全有必要花些笔墨，将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加以简要的综述，看看是怎样的时代锣鼓，召唤他们走上历史大舞台的！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6页。

②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9～430页。

一、铁器·牛耕·水利工程

(一)铁器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奔腾不息的黄河、长江以她母亲般的乳汁哺育了古老的华夏文明。由于这两大河流的中下游地区土壤肥沃，雨量充沛，灌溉条件良好，原始农业很早就出现了。远在 4000 多年前的夏朝时期，在我们的祖先还以木、石、骨、蚌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条件下，今天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就已经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过程。这种以宗法血缘制、分封制和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社会，以其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绵延了夏、商、周三个朝代近 2000 年之久。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美仑美奂的青铜器制作工艺虽然臻于成熟、完善，但这一时代的青铜器主要是生活用具，而不是劳动生产工具。殳铁虽然已被发现是一种比青铜更坚硬、更锋利的金属，但由于原料稀少，并没有成为普遍性的劳动生产工具。采矿冶铁制造生产工具还没有提上历史的日程。夏、商、西周时期，井田上盛行的劳动方式是奴隶们大规模的集体耕作：“十千维耦”、“千耦其耘”。在这一原始劳动方式之下，使用的劳动工具仍然主要是木、石等非金属工具。

周幽王十一年(前 771 年)，西周最后一个君主——幽王被戎人杀死于骊山脚下。次年，他的儿子周平王将都城从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因为鲁国史书《春秋》对此后 300 年左右的历史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所以又称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476 年这一时期的历史为春秋时代。迨至春秋，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材料，我们已经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描绘出一幅使用铁器进行生产的动人画面。春秋初期，齐国的农业生产已经开始使用耒、耜、铤等铁

制工具,手工业生产也大量使用钺、刀、斤、锯、锥、凿等铁制工具^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曰:“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国语·齐语》曰:“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斲,试诸壤土。”此外,近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湖南长沙、江西九江、河南洛阳及江苏六合,发现了春秋中晚期的铁农具,可见铁器在春秋业已成为较普及的劳动生产工具了。

在春秋铁制工具渐趋普及的基础上,战国早中期铁器生产技术和铁制工具在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地位进入了一个更高更新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生铁冶铸技术

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周敬王七年(前513年),晋国铸造了一个铁质刑鼎,把范宣子所著的刑书铸在上面。铸刑鼎的铁是通过军赋方式向民间征调来的,这说明至迟在春秋末期就出现了民间炼铁作坊,而且已较好地掌握了生铁冶铸技术。近年来相继出土了一些战国早期吴、楚等国的铁器遗物,其中江苏六合程桥吴墓出土的铁丸与铁条,经金相考察证明,前者为白口铁铸件,后者是用块炼铁锻成的,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关于生铁冶铸器物的最早的实物见证。生铁的冶炼在冶金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欧洲一些国家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已能生产块炼铁,公元初罗马已偶而能得到少许生铁,但多废弃不用,直到14世纪才使用铸铁,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而我国古代仅用较短的时间就实现了这一技术突破,出现了铸铁,这与我国奴隶社会时代高度发展的青铜冶铸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它从矿石、燃料、筑炉、熔炼、鼓风与范铸技术等各方面,为生铁的冶炼都准备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改变了块炼法治炼与加工都较费工、费时的状况,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成本,使得较大量和较省力地提炼

^① 《国语·齐语》。

铁矿石、铸造器形比较复杂的铁器成为可能。这就为铁器的普及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同时也为我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展开拓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2. 铸铁柔化术

战国早中期已广泛使用铸铁工具，但是，早期的铸铁是质脆而硬的白口铁，很容易折断，不耐用。因此，当时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柔化铸铁的技术。洛阳水泥厂战国早期灰坑中出土了一些铁铤和铁钁，经检验表明，它们都是生铁铸件经柔化处理而得的产物。铁铤是经过较低温度退火得到的，它是白心韧性铸铁或铸铁脱碳钢件的前身或初级阶段的产品；铁钁则是经较高的退火温度和较长的退火时间处理的，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出现的黑心韧性铸铁铸件。显然，人们是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获得通过一定的热处理，可以改善白口铁性脆易断裂等弱点的可贵认识。并且经过了一个长时期摸索试验的过程，才从不完善到较熟练地掌握热处理脱碳技术的。增强了强度与韧性的韧性铸铁的出现，在冶金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使得生铁广泛用作劳动生产工具成为可能，大大增长了铁器的使用寿命，加快了铁器替代木、石等生产工具的历史进程。欧洲迄至 1732 年才使用白心韧性铸铁，黑心韧性铸铁到 19 世纪才由美国研制成功，而我国远在战国早期已能生产这两种高强度铸铁，比欧洲要早 2000 年以上。

3. 渗碳制钢技术的发明

渗碳制钢技术至迟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发明。1976 年在湖南长沙出土了一把战国早期的钢剑，经取样分析，它所用的钢含碳量为 0.5%~0.6% 的中碳钢，剑身断面可以看出反复锻打的层次。这一考古发现与文献所记“楚国之民，齐疾而均，速若飘风；宛钜铁施，利若蜂蛰；胁蛟犀兕，坚若金石”^①正好可以相互印证。渗

① 《商君书·弱民》。

碳制钢这一新技术的发明，为社会使用比铁更锐利、坚韧的工具与武器提供了科学依据。综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断定，战国早期至少在江汉地区一带已经在使用这一新技术产品了。

这三项重大的技术发明是冶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劳动人民长期劳动实践的经验总结。每一项科技发明都推动着生产工具不断地更新换代，同时，也就直接为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条件。

随着冶铁技术的高度发展，铁器在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领域逐渐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东海之滨到川陕地区，从辽河流域到江淮广阔沃野，几乎到处都有战国时期的铁器出土。河南辉县魏墓出土有犁铧、镰、锄、耜、斧、镰；湖南长沙的楚墓、河北兴隆的燕国遗址，都发现了农具和制造这些农具的铁范。在河北石家庄市庄村赵国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铁制工具占了全部铁、石、蚌质工具的65%。辽宁抚顺莲花堡燕国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则占全部出土农具的90%以上。这种情况在文献史料上，也有同样的反映。“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铧、一镰、一耨、一椎、一铎，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钁、一钻、一凿、一铍、一轳，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铍，然后成为女”。^①这些都充分说明，铁器在春秋战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生产与生活工具。同时，铁器的广泛使用又是推动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向前发展的最基本的杠杆之一。

（二）牛耕技术的普及

我国劳动人民对畜力的利用有着一个相当悠久的历史。一开始，畜力是用来代步、载重、拉车等等，畜力成为一种交通工具。虽然我国新石器时代便有了石犁，不过那时是靠人力来拉动的。夏朝

^① 《管子·轻重乙》。

“夏仲造车”，商人“王亥服牛”，周人叔均“始作牛耕”，再证诸考古材料，我们大致可以肯定，商代不仅用畜力当作交通工具，而且有可能存在着牛耕。甲骨文中有勿字，象耒翻土、土粒着于刃上。晚期甲骨文中又有从牛从勿作“𠩺”形，象牛拉着耒翻耕土地，但这种现象在春秋以前是不多见的。

春秋中期以后，牛耕农业开始普及，这种社会现象在文献与考古材料中均有所反映。春秋晚期晋国的范氏、中行氏逃到齐国避难，其滞留晋国的子孙则沦落为农夫，有人说，这样“令其子孙将耕于齐”，好比“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①春秋晚期以来的人名，对牛与耕的联系也有了大量的侧面表现。如晋国大力士名牛字耕，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河南辉县的战国大墓中，以及河北易县等地，都曾出土过V字形铁犁铧。以河南辉县的出土为例，它的重量约为一市斤，斜边长17.9厘米，夹角为120度左右。前端尖锐，后端宽阔，锐端有直棱，能加强刺土力；但是这种犁比较窄小而轻，还没有翻转土块的犁壁，因此，它只能起破土划沟作用，不能翻土起垄，但是比起依靠人力用耒耜来垦耕土地，仍不失为耕作技术上的一次革命。

有了牛耕，加上锐利的铁制犁具，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翻地的质量，再加上农业生产都已广泛地使用铁制农具，这样就必然把当时的农业生产推进到一个精耕细作的新阶段，从而使农业生产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据《吕氏春秋·上农》篇记载：中原各国迨至战国中期，上等之田一人耕种即可供养九人，下等之田一人耕种也可养活五口之家。如果精耕细作，还可以“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江西新干县曾发现四座战国大型粮仓，每座面积达600平方米左右，仓内尚保存着大量的粳米。由此不难看出，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当时的农业生产已是

① 《国语·晋语九》。

相当发达了。

(三)星罗棋布的水利工程

代表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星罗棋布点缀于祖国大地上的大型水利工程。我国的水利建设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经过夏、商与西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便出现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发展高潮。这时兴建的水利工程,可以分为灌溉工程与运河工程两大类。

1. 灌溉工程

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始于春秋,盛于战国。这一现象是当时各国实施封建重农政策的一个重大措施。这一时期的灌溉工程,主要有芍陂与漳水十二渠。

芍陂。芍陂是我国古代较早兴修的一座大型蓄水灌溉工程。它位于安徽寿县安丰城南,所以又叫安丰塘,是公元前6世纪末由楚国令尹孙叔敖领导修筑的。水库的设计恰当地利用了当地东、南、西三面较高而北面低洼的地貌特点,因势筑成。其时可能已有水门和闸坝的设置,“陂有五门,吐纳川流”,^①指的应该就是这一调节水量作用的设施。陂周大约百里,灌田近万顷。芍陂的兴建,使得这一地区的水稻种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漳水十二渠。漳水十二渠是魏国专为灌溉农田而开凿的大型渠道。魏国的邺城(今河北临漳县)位于太行山东部的冲积平原上,漳水自西向东流过,雨季时河水宣泄不畅,时常泛滥成灾。当地的劣绅和女巫勾结成奸,玩弄“河伯娶妇”的把戏,向老百姓勒索钱财,虐待少女。魏文侯统治时期(前424~前387年),西门豹任邺令,他首先破除“河伯娶妇”的愚昧迷信,把装神弄鬼的女巫扔进洪水,以儆效尤,随即发动群众开凿了十二条大渠,各渠设有调节水

^① 《水经注·肥水注》。